

# 小人物的精神史诗与历史的艺术活化

## ——音乐剧《王二的长征》角色解读与创作启示

肇东

中国国家博物馆

**摘要:** 音乐剧《王二的长征》以小人物王二的精神成长为核心,勾勒出旧中国的社会图景与长征历程的壮阔史诗。本文聚焦剧中核心角色,剖析其时代背景、个体故事及其对王二精神蜕变的推动作用,彰显作品“以群像叙事解构历史”的艺术巧思,结合故宫音乐剧《角端》、中国国家博物馆肢体戏剧《俑立千年》等案例,探讨音乐剧活化历史文物的路径与策略,为红色主题艺术创作创新及历史文化传播提供参考。

**关键词:** 《王二的长征》; 角色解读; 唱段评析; 文物活化; 红色主题创作

**DOI:** 10.65976/3080-0374.2026.05.050

音乐剧《王二的长征》是中国首部以长征为题材的两幕原创音乐剧,由著名音乐人三宝担任艺术总监与作曲,编剧关山创作剧本并作词<sup>[1]</sup>。剧中有“王二”“同志”“文工团”“红米饭”“汉阳造”“大鼻子”“自由颂”“老革命”“反动派”九位核心角色,以及卫生员、司号员、通讯员等次要角色。全剧共计二十首歌曲,分别为《王二》《信》《人》《不》《火》《枪》《身》《马》《他》《手》《亮》《诗》《路》《土》《疼》《问》《家》《字》《走》及《国际歌》。

### 一、革命启蒙与人格觉醒: 同志与文工团的引领之力

“同志”与“文工团”是王二革命之路的启蒙者与引路人,分别承载着革命理念的传递与个体人格的唤醒,其故事勾勒出革命精神如何穿透底层民众的蒙昧,以及红色运动对个体价值的解放。

“同志”是中央苏区留守红军的骨干,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与4万余名留守人员一同坚守根据地,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用生命践行着“坚定信念、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sup>[2]</sup>。在弥留之际,他将救命干粮分给逃亡的王二,留下“切莫跪着叫老爷,人人生来都平等”的箴言,并于临终前托付王二给未出生的孩子送信,信中写着“给所有的孩子创造新的家、开辟新的路”的嘱托,道破了革命者的革命初心,为后代挣脱压迫、赢得未来。彼时的王二尚处于“为报私仇而逃亡”的蒙昧状态,“同志”的善举与箴言,让他第一次接触到“平等”“尊严”的概念,革命于他从“陌生名词”转化为“报恩使命”,送信的征途成为他被动踏入革命洪流的起点。唱段《信》以合唱的递进节奏,展现了王二从怯懦犹豫到坚定承诺的心理转变,凸显了革命意志在生死交接中的传递力量。

“文工团”的命运是旧社会个体被物化的缩影。民国时期战乱频发、经济萧条,人口买卖屡禁不止<sup>[3]</sup>。她自幼被以“一袋米”的价格卖给戏班,险些沦为官老爷的姨太太,最终被红军解救,重获自由与尊严。加入红军后,她以文艺为武器开展宣传工作,成为革命思想的传播者。她与王二的3次交集,构成了王二人格觉醒的完整轨迹。初次相遇时,一句“认全信里的字,我才会好好看你一眼”,点燃了王二学习知识、摆脱蒙昧的渴望;雪山绝境中,两人十指相扣、相互取暖,让王二从“只顾自保”生出“牺牲奉献”的意识;长征终点处,王二已能完整背诵残破信中的内容,完成了从“依附他人”到“独立个体”的蜕变。这一角色打破了“革命宣传”的刻板印象,以文艺的柔性力量引导王二建立人格自觉,证明红色革命不仅是阶级解放的运动,更是个体价值的觉醒过程。唱段《人》以男女二重唱的轻柔旋律,刻画了王二初识“人”字时的好奇与敬畏,而《手》则通过温暖的和声,展现了革命情谊中彼此守护的力量,推动王二完成了从“奴仆意识”到“人的自觉”的关键跨越。

### 二、底层民众的苦难与抗争: 红米饭与汉阳造的觉醒之路

“红米饭”与“汉阳造”是旧中国底层民众生存境遇与抗争意志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故事展现了阶级压迫下底层群体的觉醒。

“红米饭”原本是市井的商贩,因拒绝向县太爷跪拜,被打断腿扔到雨中示众,侥幸活下来后毅然参加红军。这一情节是近代中国地方官僚与土豪劣绅勾结、肆意践踏民众尊严的社会现实,底层民众稍有反抗便遭残酷镇压,生存权与人格权都无从谈起<sup>[4]</sup>。他说的“当红军闹革命,不只是为了一碗红米饭”,点

透了革命的深层意义：革命不只是解决温饱，更是打破阶级压迫，追求人格尊严与社会平等。

王二最初只是为了帮恩人“同志”送信，革命等同于“报恩”。而“红米饭”的遭遇让他对革命的理解有了质的转变，懂得了一个人的苦难不是偶然，而是旧社会阶级压迫的必然结果。只有推翻剥削制度，穷苦民众才能真正解放。剧中唱段《火》塑造了“红米饭”坚韧不屈的性格，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的阶级压迫与社会结构下，革命成为了底层民众争取解放、改变命运的根本途径。

“汉阳造”的命运更为悲惨，粮食被抢、家园被毁、人格受辱，未婚夫与父亲都在战乱中丧生。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匪患横行、官府失职，让底层女性的生存处境雪上加霜<sup>[5]</sup>。但她没有向命运低头，主动拿起武器参军，“我爹说过，最好能有把自己的枪”这句话，彰显了底层百姓对命运的主动抗争，在强权压迫下，旧社会的百姓只有奋起反抗，才能捍卫尊严，获得生存权。

王二原本只局限于个人恩仇的认知，在“汉阳造”的故事冲击下得以拓展，他意识到天下还有无数和“汉阳造”一样受苦的民众，革命的意义远不止个人复仇。同时，“汉阳造”的形象打破了“女性需要被保护”的传统认知，让王二明白，革命不分性别，追求人格尊严者皆可成为革命者。唱段《枪》以铿锵有力的旋律，展现了“汉阳造”的复仇决心与革命意志，推动王二从“被动逃亡”走向“主动抗争”。

### 三、多元群体的革命参与：大鼻子与自由颂的信仰之光

“大鼻子”与“自由颂”的角色设定突破了传统革命者的身份边界，丰富了革命内涵，展现了革命理想对不同背景群体的感召力。

“大鼻子”在剧中承载着东西方文化与信仰对话的功能。该角色的原型应是英国传教士勃沙特，他是唯一参与红军长征的西方人，起初，受西方不实宣传影响，他对红军充满怀疑与抵触，但在与红军相处的过程中，红军的平等相待、战士间的互助友爱，逐渐改变了他的看法，最终与红军结下深厚情谊，他将自己和红军战士的日常生活记录了下来，这本回忆录也成为了西方国家出版的第一部涉及红军长征的书籍——《神灵之手》<sup>[6]</sup>。“大鼻子”和王二关于信仰的对话“我们信上帝，你们信共产主义；我们说赎罪，你们说斗争，其实战胜疾病也是一种斗争”，点出了东西方信仰的核心差异：西方宗教侧重“被动赎罪”，而共产主义倡导“主动斗争”。

这段对话让王二明确了一个关键认知：“解放”不能依赖外部救赎，必须通过自身主动抗争实现。而

一位西方传教士对红军的认可，也印证了追求自由解放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剧中“大鼻子”的《马》与《他》两首唱段，核心叙事清晰，用东西方受众都能理解的音乐语言，传递“信仰无国界”的理念。

“自由颂”曾是上海租界的富家小姐，在洋学堂求学时，受普希金《自由颂》中“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理想感召，舍弃锦衣玉食的生活投身革命。这一角色背后，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鸦片战争后西方思想逐渐传入，五四运动前后，普希金等俄国作家的作品对中国进步青年影响深远，而国家危亡的现实，让“自由”“平等”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与青年群体的核心追求<sup>[7]</sup>。

王二最初对“自由”的理解，只是“摆脱地主追捕、活下去”，而“自由颂”的理念与实践，让他对“自由”有了新的认知，明白了真正的自由不是个体的逍遥自在，而是打破阶级压迫的枷锁，实现全体受压迫者的解放。唱段《诗》以优美舒缓的旋律，展现了“自由颂”对理想的纯粹追求，也让王二明白，革命不仅有苦难与牺牲，更有浪漫与崇高的精神价值，推动他从“只顾自己”转向“心系集体”。

### 四、革命信仰的对照：老革命与反动派的价值之辨

“老革命”与“反动派”形成鲜明对照，通过正反两极的叙事，凸显革命信仰的核心价值，推动王二对革命本质的认知升华。

“老革命”年仅十九岁就担任团长，十二岁投身革命，是长征中“红小鬼”群体的典型代表，这个群体年纪虽小，却肩负着学习文化与参加战斗的双重使命，用稚嫩的肩膀扛起革命责任<sup>[8]</sup>。在沼泽地营救王二时，他说“真正的战士，就算心里再疼、再想念，也能赴汤蹈火”，深刻诠释了革命信仰的本质，信仰不是逃避痛苦，而是在苦难与考验中坚守初心、勇往直前。

一个本应在学堂读书的少年，为了他人的解放毅然投身革命，这种牺牲精神给王二带来强烈的精神震撼。他让王二认识到，革命精神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的行动与意志的锤炼。唱段《士》以雄壮有力的旋律，彰显了“老革命”的英雄气概，让王二从心底认同了“战士”的身份与责任。

“反动派”则呈现了信仰缺失的悲剧，他先后效力于北洋军、革命军等多个派系，经历了被俘、投降、叛变等多次身份转换，最终沦为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这一角色折射出近代中国军队的乱象，部分军队将领以权谋私，士兵缺乏明确信仰，枪口不指向真正的敌人，反而对准无辜民众<sup>[9]</sup>。

他对王二说“撕掉帽徽就能调转枪口”，直白暴

露了其“当兵为私利”的本质。与“老革命”形成鲜明对照，让王二认识到革命军队与反动军队的核心区别不在于武器装备的好坏，而在于是否以民众利益为根本立场。最终“反动派”因内心愧疚与信仰崩塌走向自我毁灭，这一结局进一步坚定了王二“跟随红军走”的信念。唱段《问》以低沉迷茫的旋律，刻画了“反动派”内心的挣扎与绝望，与《士》的激昂形成强烈艺术反差，更凸显了革命的正义性与信仰的力量。

### 五、王二的精神蜕变：历史的见证与传承

上述核心角色，构成了王二精神成长的八级阶梯，推动他实现了从“个体复仇”到“信仰坚守”的完整蜕变。从“同志”那里领悟“平等”的内涵，到“文工团”促成“人格觉醒”；从“红米饭”那里认清旧社会的阶级本质，到“汉阳造”那里学会“主动抗争”；从“大鼻子”那里明确“解放”的主动属性，到“自由颂”那里领悟“理想”的崇高价值；从“老革命”那里坚守“信仰”的核心地位，到“反动派”那里看清“自私”的悲剧结局，王二的精神世界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丰富、坚定。

最终，王二彻底摆脱了“为报私仇而逃亡的农民”的初始身份，成长为有明确信仰与责任担当的革命者。他深刻领悟到革命的三重本质：革命的目标不是个体生存，而是全体受压迫者的解放；革命的路径不是依赖外部救赎，而是依靠自身的主动斗争；革命的实践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具体的行动坚守。

《王二的长征》通过9位角色的叙事交织，将旧中国的社会动荡、民众苦难、红军的英勇抗争与民族的未来希望，浓缩在两小时的舞台上。王二的精神成长轨迹作为核心线索，将碎片化的个体叙事串联成完整的历史图景，让观众在跟随角色成长的过程中，重温长征历史、体悟革命精神的核心内涵。

### 六、结语

《王二的长征》以“小人物视角”与“群像叙事”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成功实现了长征历史的艺术再现与革命精神的传承升华。剧中8位核心角色以鲜明的个性与深刻的叙事内涵，既展现了旧中国的社会百态，也推动了主角王二的精神蜕变。19首原创唱段与人物、剧情高度契合，彰显了音乐剧传播历史的独特艺术魅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剧在音乐的创作上有着明显的借鉴和引用。例如《信》的部分旋律让人联想到《变身怪医》，《不》的部分旋律让人联想到《理发师陶德》，《枪》的部分旋律让人联想到《悲惨世界》，《手》的部分旋律让人联想到歌曲《青藏高原》。作者在音乐的创作中更是直接引用了《圣母颂》《国际歌》的完整西方曲调，虽意在分别升华革命主题与体现信

仰包容，但两首名曲鲜明的音乐形象也会对剧中原创新旋律产生冲击，暴露了其过度依赖经典、弱化自身旋律个性的问题。当熟悉的《圣母颂》音乐响起时，却伴随着“大鼻子”演唱的并不相同的旋律，不免让观众心中产生疑问，也难以接受这种虽然音程关系和谐，但听起来却别扭的感觉。结尾的《国际歌》将全剧推向了最高潮，虽然其他唱段各有特点，但观众在观看完整部剧后，脑海里最先浮现和随口唱出的却不是该剧的原创曲目，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失败”的。

不过，虽然在音乐上存在着一定的“瑕疵”，但该剧依旧为红色主题艺术创作与历史文化传播提供了创新路径。以音乐剧为载体激活历史文物的叙事潜能，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转化为受众可感知的艺术作品，不仅能丰富音乐剧的创作题材，更能拓宽历史文化传播的渠道与维度，让历史文化在当代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与认同。故宫《角端》、国博《俑立千年》等案例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路径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红色主题艺术创作的核心使命是传承与弘扬革命精神。《王二的长征》的实践表明，历史题材创作不必拘泥于宏大叙事，小人物的精神成长同样能展现历史的壮阔图景；艺术表达不必局限于传统形式，音乐剧等综合艺术能够实现历史与艺术的深度融合。未来，随着文物活化理念的不断深化与创作技巧的日益成熟，有望涌现出更多优秀的红色主题音乐剧作品，让红色历史在当代焕发出新的艺术活力，让革命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 参考文献：

- [1] 张春娟. 三宝音乐剧《王二的长征》搬上合肥舞台[J]. 歌剧, 2014(1):65.
- [2] 牟蕾, 黄伟. 中共中央与中央分局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互动[J]. 党的文献, 2018(2):76-81.
- [3] 张秀丽. 民国时期农村经济与农村妇女买卖——以禁止婢女买卖为中心[J]. 农业考古, 2013(6):94-98.
- [4] 林胜强. 革命实践及其生成机制：国民革命时期的“阳新二二七惨案”[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0(5):31-43.
- [5] 马建堂. 民国前期四川土匪成因论析[J]. 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22(6):59-61.
- [6] 李文乾. 《神灵之手》：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内幕的书[J]. 党史博览, 1998(9):36-37.
- [7] 罗志田. 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3):20-35.
- [8] 何志文. 长征路上的“红小鬼”[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6(10):70-80.
- [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1-270.